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2.008

# 英国知识分子的信仰危机与反思研究

——以《大闪蝶·尤金尼亚》为例

李立新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英国当代女作家 A.S.拜厄特在小说《大闪蝶·尤金尼亚》中再现了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国教信仰体系对各阶层知识分子智识发展和自我界定的压制和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僵化的宗教教义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引发了他们的信仰危机,将他们推向精神和事业的伦理选择困境;另一方面是神学家们以博爱之名美化了权力阶层的统治,掩盖了维多利亚盛世下贵族自身的堕落和罪恶。拜厄特借信仰书写强调宗教信仰冲突与反思对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是灾难,而是一个以知识探索的开放世界取代神学封闭世界的重大机遇。从知识分子信仰危机的视角研究这部小说有助于研究拜厄特的宗教观、政治观及文学创作观,也是了解 19 世纪 60 年代英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拜厄特;英国知识分子;信仰危机;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2-0044-07

英国当代女作家 A.S.拜厄特的《天使与昆虫》是继《占有》之后又一部探索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风俗和人文传统的力作。小说由《大闪蝶·尤金尼亚》和《婚约天使》两个短篇构成,其中《大闪蝶·尤金尼亚》的时代背景适逢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两周年。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是这个时期维多利亚社会知识分子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是解读拜厄特这部“最具智慧”的短篇小说的关键点之一。拜厄特在《论历史与故事》中阐述了作品的创作动机,除了“在信仰危机的存在主义时刻构建它们(维多利亚时代)”,更多的是“对宗教的自然历史感兴趣”。这种兴趣一方面体现在她对宗教知识分子信仰焦虑的书写上;一方面她强调小说以 19 世纪的科学家作为主人公是因为“他们不把时间花在解构世界或者在理论上对价值的抽象术语吹毛求疵上”<sup>①</sup>,而是致力于对自

然世界与事物本质的探索。但根深蒂固的宗教教义却一直困扰着他们,使他们浸泡于理性世界与神性世界不断冲突的双重意识之中。

知识分子的宗教焦虑推动了维多利亚社会中后期思想观念的变革,打破了人们一直以来奉行的“上帝等同于真理”的谬论。“真理是思考的产物,没有外在于个人的真理。任何主义学说和理论,如果不能化为个人的信仰,不能深入到个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就不可能构成真理。”<sup>②</sup>而成为知识分子就意味着“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sup>③</sup>。对真理的把握是与主体的意志自由密切相关的,这是知识分子一直渴望的东西,“渴望拥有根据自己的信仰和思考来行动的自由”<sup>④</sup>。这就解释了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为何常处

收稿日期:2019-09-20

基金项目: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19-ZZ-WX-11)

作者简介:李立新(1978-),女,山东德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英国小说研究。

①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8-109 页。

②林贤治:《午夜的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漓江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1 页。

③Bauman, Zygmunt.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2.

④弗拉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6 页。

于一种创造性的焦虑状态中,与主流宗教话语对个体的工作与日常生活的规约和限制产生冲突。拜厄特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群身份背景不同却热爱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们试图摆脱基督教教条的束缚,开展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威廉的科普著作,马蒂的神话故事书写以及哈罗德的神学著作等在信仰反思层面可被视为维多利亚中后期知识分子对个体与时代危机进行反思并谋求应对之策的表现。

### 一 知识分子信仰危机的形成和影响

小说主人公威廉·亚当森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构成一个各种矛盾冲突的交叉点。拜厄特把他设定为“像华莱士·贝茨和斯普鲁斯那样的中低阶级亚马逊探险家”<sup>①</sup>。他的自我界定与欧洲文明社会与亚马逊的原始丛林,神创说与达尔文进化论,宇宙的有序与无序等二元对立的观念捆绑在一起,不断地瓦解又重建。威廉·亚当森这个名字本身也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威廉(William)之名源于“伟大的征服者威廉”,在历史上这位智慧的君主为英国带来了先进的政治体制,促进了英语语言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是进步与革新的象征。拜厄特借此名寓意作为科学家的他代表了维多利亚中后期新的科学思潮与社会变革的方向。亚当森(Adamson)这个名字与英国国教奉为圭臬的《圣经:创世纪》中的人类始祖亚当有着极深的渊源<sup>②</sup>。小说中对威廉科学考察的多处描述也佐证了这一联系,比如威廉热衷于命名亚马逊丛林中的稀有昆虫物种与圣经中亚当在伊甸园中命名上帝创造的万物的行为如出一辙。拜厄特将所指不同的姓名放在同一个人物上暗示着威廉的个体认知困境以及与基督教思想扯不断的牵连。

青年博物学家威廉·亚当森的信仰焦虑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源于他原生家庭宗教环境的浸染。他从小接受了严苛的宗教教育。父亲是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不仅自己恪守教会的

规矩,还要求子女们必须按时参加礼拜活动。整个家庭弥漫的宗教氛围给威廉的意识形态打上了鲜明的宗教烙印。其次源于科学话语对宗教教义的质疑和解构。成年后的威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开始质疑宗教话语的权威性。作为一个常年漂泊在亚马逊原始丛林中研究自然生物的博物学家,他利用观察与实验等实证方法对动植物的区域分布、繁殖变异等进行探索和总结,印证了达尔文进化论倡导的自然界本身具有发展规律,其演化与发展与上帝无关的观点。最后他的犹疑还与维多利亚社会主流话语对宗教信仰的敬畏和尊崇密切相关。

“对维多利亚人来说,一个被大家公认的宗教身份不仅仅是个人偏好的问题。对信仰的忠诚,无论是哪种信仰,是个体获得尊重的基本条件,往往也是获得体面工作的基本条件。”<sup>③</sup>

威廉的经济困境使他接受了老派牧师兼收藏家哈罗德提供的工作,在其“能够证明有一个神圣的造物主存在,并经得起理性怀疑的检验”的著作中充当“魔鬼的辩护者”<sup>④</sup>。在辩论的过程中威廉将自然界的不可知论思想拓展至整个人类社会学领域,同时引发了对自己秉持的科学的价值观是否正确的焦虑。这同时说明知识分子并不都是,也不会一直是捍卫真理的斗士。他们会在压力下退缩并顺从主流的意识形态,甚至会出卖自己的意志自由来换取舒适稳定的生活。威廉这个穷困的知识分子在理想主义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中挣扎,试图质疑基督教传统,却又无力承担后果。

信仰焦虑一直困扰着威廉,不仅对他的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还冲击着他的伦理观与人生观。他父亲信仰的卫理公会的教义高扬人文主义与博爱理想,认为维系信仰最有效的方式是对神的虔诚和敬畏,排斥对神的内涵进行理性的思考。他们严格强调原罪、赎罪、永罚等,这与威廉所处的社会转型时期盛行的启蒙精神格格不入。陈旧的教义、教规与新时代推进人类进步的理想和价值相违背使威廉对父亲的信仰产生了怀疑,

①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60页。

②Celia Wallhead. *A. S. Byatt: Essays on the Short Fiction*. Bern: Peter Lang AG. 2007, p.45.

③Dinah Birch. *Our Victorian Educa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8, p.44.

④A.S.拜厄特:《天使与昆虫》,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01页。(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而这种怀疑和分歧导致他与父亲的彻底决裂。“父亲因此跟我完全断绝了关系,将我逐出家门。我如今贫困潦倒,更深层的原因在这里。”父子关系的恶化使威廉失去了家庭的温情和资助,生活几乎陷入了绝境,在精神上成为他无法言说的创伤。

对自然界生物的书写缓解了威廉的忧郁和信仰焦虑。在哈罗德家寄居的这段时间,威廉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开展了对盘地蚂蚁的研究。他努力使自己的发现和思考诉诸于文字并最终选择了非虚构性的反映科学事实的科普读物这一题材,而非神话或者小说,从而规避了造物主意象的存在与干扰。“关于自然界向我们诉说的东西……要求他不要设定一个设计者,或一个家长。”<sup>①</sup>威廉在书的末尾重申了自己对神性世界的质疑,呼吁读者观察自然之美,开展智性思考。他的著作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为他赚取了重返亚马逊的旅费,使他摆脱了因经济窘迫而寄人篱下的生活,实现了再次进行科学考察的愿望,这同时寓示着大众对自然科学的认可与接受。威廉“正是因为挣脱了宗教信仰的束缚,才使得理性的、系统的、逻辑的思考成为可能,才能够焕发出创造性、启发性的光明,从而挖掘出自然界的内在规律”,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价值和学术梦想。威廉的这种转变契合了鲍曼提出的新时期知识分子角色“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转变。他们“推进交流,转译在一个团体传统之内的言说,使它们能在另一传统的知识体系内被理解”<sup>②</sup>。威廉通过描述蚂蚁社会与蚂蚁的利他主义,激励读者去寻找被人类遗忘的利他主义。小说引用华莱士·史蒂文斯的《朝向最高虚构的笔记》中的诗句“去寻找,而非强加/这是可能的,可能的,可能的。必须是/可能的”<sup>③</sup>,隐喻了知识分子角色从知识或思想的单纯的解读者或布道者逐步向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转变的可能性。

国教牧师哈罗德的信仰危机深刻地再现了维

多利亚时期英国国教教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拜厄特笔下,哈罗德是一个符合维多利亚时代教会要求标准的国教教徒。从穿戴上,“他戴着牧师服的硬白领,臃肿的裤子配一件宽松的黑夹克,在这些行头之外又套了一件类似教士袍的东西”;从表情上,他“像圣父一样”充满慈爱;再从日常行为上,他的“一天是从上小教堂做晨祷开始的”,“祷词格调柔和,内容都和爱与家庭温情有关”。这种对信仰的坚定和维护是值得尊重和敬佩的,但也反映出19世纪以来英国圣公会对牧师职责前所未有的规范和监管。牧师每周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布道活动,定期走访教区信众,帮助贫苦信徒。这种程式化、职业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生活的过度封闭终将导致宗教知识分子思想的僵化与行为的教条化,从而限制了宗教思想在广义范围内的传播,也钳制了人们对宗教深远意义的追索,在根本上限制了宗教信仰的长期健康发展,从而把那些教会体系内的渴望应对社会思想变革的神学家推进了信仰焦虑之中。

宗教学者的功能被广泛地认为是忠诚地解读上帝向信徒传达的神秘信息。他们的观点通常是“非个人的”,试图证明的是“他们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因为所有这些都以善良的神圣权威为基础”,只能依靠“与绝对确实、无所不包、既不能去证实也无法增添的真理保持一致而获得力量”<sup>④</sup>。在科学新观念的冲击下,这些学者逐渐无力保证圣训不受到更改或者亵渎。他们通过批判性反思,试图建立圣训与科学相辅相生的宏伟体系来重构造物主的权威。老牧师哈罗德即是这样一位神学知识分子。“象征着旧世界秩序”<sup>⑤</sup>的他却对自然科学极为好奇和喜爱,这使他成为一个标本收藏家。他的家中摆满了各种动植物的标本,却被毫无章法的散落在各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拥有充裕的资产和时间,具备文艺创作需要的物质条件,但他的神学著作最终却未能顺利完成。这种失败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概念上,

①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页。

②Bauman, Z.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7, pp.4-5.

③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页。

④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郑斌祥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⑤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一个是形式上。从他要传达的理念来看,他试图用进化论的观点去证明圣经旧约存在的合理性,采纳了哈佛生物学家格雷的主张。格雷指出达尔文在谈及人的眼睛的进化时认为这是造物主的神来之笔<sup>①</sup>。另外他还关注伦理层面“从神秘的方向和爱的确定性这个角度来论证上帝存在的确定性”,把上帝看作一个大家庭的父亲,从父亲之爱中推论出上帝的存在。威廉以费尔巴哈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这种靠类比得来的主张是人类思想的自我投射。哈罗德却认为“通过某些自然主义者看待昆虫的方式来类比,从而假设我们只是自动机器,同样是错的”<sup>②</sup>。但哈罗德这种与科学妥协式的尝试找不到合适的、权威的框架来呈现他的论点,从而导致形式上的失败。各种思想在他的脑海里杂乱地缠绕在一起理不清头绪最终导致他思维的瘫痪。

与两位男主人公焦虑犹豫的形象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中仅有的一位知识女性马蒂的变形与成长。她和威廉一样是寄居在哈罗德家中的远方亲戚,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和自主稳定的生活。最初从威廉的视角来凝视她不过是一个身材干瘪,默不作声,性别特征不明显的老姑娘形象。在妻子尤金尼亚的丰满的身材,光彩夺目的舞姿,高贵的身份比照下,马蒂对男性毫无吸引力。事实上,在危机四伏的哈罗德家族中马蒂是刻意掩盖自己的过人才华和女性特征。寒酸的中年妇人形象使马蒂能够自由地按照内心对生命真正的需求去生活,而不是被迫遵循维多利亚崇尚的婚姻和家庭传统,受到夫权思想的禁锢和家务的束缚;另一方面,从女仆艾米被哈罗德之子埃德加诱奸怀孕被赶出庄园的悲惨遭遇来看,马蒂保持朴实无华的外在形象是一种无奈而又明智有效的自我保护策略。

然而,这样一位没有钱,没有漂亮脸蛋,也没有尊贵地位的女性却有着简爱般倔强的性情、洞察时事的敏锐以及对爱情与自由的渴望。马蒂性格中的坚定与执着不仅使她实现了个人的梦想,而且在学识上、精神上与行动上对威廉给予引导和帮助。马蒂看似随口一说的建议就使得百无聊

赖的威廉找到了行动的方向,开始了对蚂蚁社区的研究。从表面上看,昆虫社区的研究是威廉带领着哈罗德家中几个家庭教师、孩子和仆人开展的。但在实际运行中,马蒂才是研究的灵魂人物:她设计研究方案,主导研究方向,总结研究数据,并鼓励威廉写本自己的书,而不仅仅是充当哈罗德写作的助手。“她懂拉丁文、希腊文和优质绘图术,对英国文学知识也无所不通。”她甚至为威廉设计好了书的题材和内容,“我希望您写的不是是一部科研巨著,也不是自传,应该是一部实用的书,写一部蚂蚁群落的自然史,写出让普通大众感兴趣的东西,同时又兼有科学价值”。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蒂虽然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乡绅家庭中,却对外面的世界和时代发展的需求有着透彻的了解。除了精神上的支持,马蒂还一手安排了威廉科学著作的出版,书大受欢迎并且卖了个好价钱。与此同时,马蒂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略施小计使威廉目睹了尤金尼亚与埃德加乱伦的场景,从而使威廉彻底断了对尤金尼亚最后一丝迷恋。她主动表达自己的感情,要与威廉一起远航。这在保守的维多利亚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被社会传统道德观接受的。但马蒂对自由、对爱情的认知与行为却完美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根本价值:除了精神上的东西,她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求。

与威廉相比,马蒂更具有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坚持真理并热爱思考,具有智性关怀和谦卑态度。“我认为一个人必须尽可能追求真实,纯粹的真实或许永远无法得到。对自己没有思考过的东西最好保持沉默。”马蒂在她创作的寓言故事《事情并不如表面所见》中表现出来的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让威廉吃惊不已,以神话中的人物映射当时社会的宗教状况。她的人生历程不仅代表了女性的变形与成长,还从侧面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小知识分子的境遇。他们同属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甚至为了生存不得已依附于权贵,但他们关注思想发展的新动向,最可贵的是不放弃最初的梦想,并坚决付诸行动。他们赋

<sup>①</sup>Gray, Asa. "Natural Selection and Natural Theology". *Darwiniana*, ed. A. Hunter Dupree. Harvard UP, 1963, pp.119-120.

<sup>②</sup>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页。

予知识与智慧神圣不可侵犯的内涵,坚信“我们的上帝就是自己,我们在敬奉自己”。

## 二 对信仰的反思和批判

从小说中知识分子信仰危机的具体表达中,可以窥见拜厄特对英国国教的反思与批判态度。首先表现在以哈罗德为代表的贵族基督教徒从个人利益出发对教义进行阐释,忽略了社会转型期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比如奴隶贸易、贫富悬殊等都是与教义相违背的。哈罗德对社会的种种不公采取了回避、扭曲教义的策略,从而使不道德的、罪恶的行为变得合情合理,丢弃了最基本的同情心与羞耻感,从根本上说是否定了国教的权威和普世价值,使得宗教与外部世界相脱节,浇灭了人们的宗教热诚。

哈罗德在这个贵族家庭中“是主人,是一个隐蔽的上帝”。他的名字 Alabaster,字面涵义为汉白玉雕刻而成的石膏。这一方面暗示着他的宗教信仰坚定如汉白玉石像般牢不可摧,另一方面姓名中嵌入的私生子(bastard)一词,暗示着乱伦在这个家族中不是偶发的行为,而是像基因般代代相传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哈罗德对儿女乱伦之事不闻不问,反而竭力遮掩。对落魄的威廉,哈罗德一开始就把他当成了捕捉的目标,要促成威廉成为女儿尤金尼亚的丈夫。对这个贵族家庭而言,威廉与尤金尼亚结婚既可以消除尤金尼亚的未婚夫亨特上尉在即将举行婚礼之前自杀所引发的人们对哈罗德家族的猜测与怀疑,又可以使尤金尼亚得到一个学识渊博的丈夫,从而给哈罗德家族带来体面和荣光。更为重要的是,尤金尼亚与其兄爱德加的乱伦关系对贵族家庭是不体面的。一直以高贵血统自居的哈罗德家族当然不能忍受自家名誉史上出现这种事情。威廉一旦与尤金尼亚结婚,哈罗德家族面临的所有名誉上的困境都迎刃而解,从而在根本上阐明了哈罗德为何热情地邀请威廉到布雷德利庄园,并慷慨地为威廉提供丰厚工资的根本动机。

小说中至少有两个地方表明了哈罗德是故意促成威廉与女儿尤金尼亚之间的相识与相恋。当

威廉第一次把名为尤金尼亚的大闪蝶展示给哈罗德看时,哈罗德第一反应就是要把自己的女儿尤金尼亚叫过来与威廉相识。他在与威廉相谈甚欢时,突然要求仆人去把女儿请来。话刚出口,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可能会暴露,于是特意加上一句掩饰的话“如果可能的话”。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自己过于明显,又进一步遮掩自己的意图,暗示“把所有的年轻小姐们都找来”。另一个地方是哈罗德在自己的书房中展示自己的蝴蝶标本是有意识地在威廉面前赞美自己的女儿,并意味深长地说:“我希望她将来也能很幸福。”哈罗德多次表示他“信奉基督徒的兄弟情谊,相信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事实上,所谓的平等只是针对阶级内部的成员,一切以本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即使是龌龊罪恶的勾当,也想方设法予以掩盖。而对那些下层贫民,是永远不会考虑他们的需求和愿望的,教条上的人人平等是有条件、有区别的。这一点在哈罗德对待知识分子威廉的方式上,还是隐蔽的和有所保留的。他通过联姻的方式掩盖了兄妹乱伦的丑行;通过提供工作的方式,阻止了威廉扬帆远航追求理想的步伐。

哈罗德家族对家中奴仆艾米的欺压却是赤裸裸的,毫不遮掩的,完全背弃了基督教义博爱仁义之情。在这个大家庭中,奴仆成群,艾米是一个还未成年的小女仆,一个佝偻着腰的瘦削的小不点,没有家,寄生在这个大家族里干些粗笨的活。因为参加了威廉的蚂蚁研究计划“她的脸上仿佛注入了某种光彩,她渐渐发育得像鸟儿般漂亮”。艾米形象的巨大反差有力地说明了以哈罗德为首的贵族家庭对普通人、对奴仆的残酷压榨,不仅是肉体上的,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控制,阻碍了年轻人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艾米的智慧和美丽没有为她带来美好的前程和甜蜜的爱情,埃德加的“关心”使得这一切化为泡影。最让人唏嘘的是,面对威廉对埃德加兽行的指责,艾米却为刽子手辩护:“没有,先生,没有,先生,没有伤害。我挺好。”而埃德加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愧疚之意,“我不会伤害这个小妞的,我只是想添点自然调味品”<sup>①</sup>。由此看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在贵族子

<sup>①</sup>A.S.拜厄特:《天使与昆虫》,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18页。

弟的眼中只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物品,而且价值低廉,用途有限。从小沐浴在宗教氛围中的贵族青年埃德加的生活除了骑马打猎、玩弄女性之外,无所事事。而为了给单调乏味的生活增加乐趣,竟然把一个少女的贞洁与前途视为调味品随意处置,其行为之恶劣、思想之下流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然而,整个家族的贵族成员没有一个对此恶行进行斥责,哈罗德夫妻不闻不问,怀孕的艾米被丢弃在收留站,女主人派人送去一点钱财就算是仁慈慷慨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罗德每天的祈祷词都包含着爱的本质的内容,号召“让人类更加理解自己的爱,让人们从家庭成员之间的自然纽带、母亲的温暖、父亲的保护、兄弟姐妹的亲密开始理解爱的本质”。这里爱的本质一方面强调上帝对具有坚定信仰的追随者的爱,而对违背上帝旨意者与质疑者予以重罚;另一方面泛指博爱的情怀。整个哈罗德家族对“爱的本质”的理解是扭曲和荒唐的。哈罗德作为一家之长,他对子女的爱是建立在包容和放纵的基础之上,爱的教育是缺失的,对子女的错误与恶行不惩戒,还纵容包庇,这不是爱的表现而是责任的逃避。女儿尤金尼亚外表高贵美丽,深陷与哥哥埃德加的乱伦情爱之中,对这种有违伦理的苟且之事,从不进行自我反思,认为就像“黑暗中的自慰”,是正常的本性使然,甚至与威廉结婚后依然故我,严重曲解了爱情的本质,贪慕肉欲的满足。埃德加的种种行为透视出他根本不知爱为何物,生活在爱的荒原之中,对妹妹也不过是肉体的占有、情欲的释放。

威廉在哈罗德家族中的经历说明以哈罗德为代表的贵族阶级对基督教义进行曲解和篡改,借宗教之名对知识分子阶层思想自由的制约和个体发展的阻碍,对弱势群体的欺压和迫害,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安全。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权威而不是威廉充当的顾问甚至廉价帮工的角色。威廉与哈罗德家族关系的破裂也象征着代表小知识分子的威廉与贵族精英哈罗德阶级和解的不可能性。从表面上看是知识分子取得胜利(即威廉摆脱世俗与精神的桎梏重又开始科考亚马逊

之旅),但这种胜利又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危机。威廉即将奔赴的是遥远而又未开化的荒蛮之地,旅途是否会遭遇海难,考察是否会达到预期目标,这一切都是未知数而且风险指数极高。拜厄特对这种磨难的设计充分说明要打破传统的信仰,挑战一成不变的道德生活需要付出的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信奉科学、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多舛的命运也预示着整个维多利亚社会从贵族阶级到下层民众全面的信仰危机的到来。

科学家威廉与信徒父亲之间的矛盾冲突反映出19世纪基督教宣扬的末日审判说对下层人民的思想的毒害。从表面上看,布道强化对神的敬畏是教育人们行善积德,诚信友好,实则是服从统治阶级的管理,安于贫困的现状,相当于统治者给劳动阶层开了一张永远不会兑现的支票,只能期待来生时来运转。“在一个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代表的是在经济和政治的阶级领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它使现存的社会结构合法化,用来世回报的许诺来减轻人们的挫折感、愤怒和伤痛。”<sup>①</sup>威廉的父亲“对地狱之火怀着巨大的恐惧,那道火焰就在他每日想象的边缘,侵蚀着多梦的夜晚”。但在现实生活中,“他给磨坊主和矿主供应上好的牛肉,给矿工和厂里的工人供应杂碎和下水”。严酷的教义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维多利亚人,而是背弃了做人的基本原则。

宗教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是知识分子们不断思索的课题。随着科学与文明的进步,知识分子逐渐摆脱僵化教条的束缚,以神为中心的文明必将最终让位于以科学、精神独立为中心的现代文明。而科学与文化又是相辅相成的,主人公威廉既是理性的科学家,也是感性的文学知识分子。他的人道主义精神除了体现在同情弱者和反对殖民暴力等社会行为上,还落实在科学研究上。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以悲悯之心看待与人类比邻而居的昆虫世界,而且使用了诗性的叙述语言。他的蚂蚁史书充满了自由、平等、互助与博爱。在昆虫的世界里没有帝王,也没有统治的中心,更没有等级差别。各种生命个体处于

<sup>①</sup>Parillo, Vincent N. *Strangers to These Shores: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earson, 2003, p.514.

平等的位置上,各有生存的空间和权利。对昆虫世界富有诗性的描述影射出他作为知识分子向往的世界就是把个人的自由权利当作发展的根本目标加以强调并付诸实现的世界。

### 三 结语

拜厄特“把小说设定在过去,不是为了逃避主义的乐趣或撕开紧身胸衣看个究竟,而是出于

复杂的审美和智识原因”<sup>①</sup>。作为知识精英,她对维多利亚时期知识分子信仰危机的理性思索深刻地表达了她对英国社会意识形态变迁的关注和对权贵知识阶层宗教观的批判。当今知识生产受到物质利益的驱动,人们对知识、真理和人权的关注在减少,对道德诉求和求真理想失去了应有的敬畏。在这个大背景下,拜厄特重申知识分子批判传统与独立价值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 Belief Crises and Reflections of the British Intellectuals:

### A Case Study of A.S. Byatt's *Morpho Eugenia*

LI Li-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In her novel *Morpho Eugenia*, Byatt reveals the Anglican'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intellectual growth of the British intellectuals in the mid and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The rigid religious doctrines suppress the intellectuals' freethinking and push them into a spiritual dilemma. The theologians, in the name of love, glorify the rule of the aristocracy and conceal their degeneration beneath the prosperity of the Victorian society. Through writing the belief anxiety, Byatt emphasizes that belief conflict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intellectuals to replace the theological world with a world that is open and full of knowledge exploration. Analyzing *Morpho Eugen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lief crises not only gives us an insight into Byatt's religious view, political view and conception of literary creation, but also functions as a key to understand the British society in the 1860s.

**Key words:** A.S. Byatt; British intellectuals; belief crises; reflections

(责任校对 龙四清)

<sup>①</sup>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页。